



# 美日貿易談判對日本經濟的影響

●李明峻／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

## 壹、前言

儘管日本經濟發展已經停滯三十年，但今日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，擁有1.4兆美元的世界第二外匯存底，擁有全球第三大金融資產，世界第二大汽車製造國，世界第五大股票交易所，世界第四大進口國和第四大出口國，也是世界第四大消費市場。同時，日本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排名第五，且經常被列為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國家之一，財富全球五百強公司中有四十七家總部設在日本，在高科技和精密產品方面的製造業也名列前茅。

但儘管如此，由於川普想要轉變國際經貿結構，對日本加徵24%的關稅，其後美日貿易談判又一再卡關，此點引發市場恐慌，投資者擔憂企業盈利與經濟前景，使得好不容易拉抬起來的日本股市大幅下跌，也導致亞洲各地股市普遍走低。到底川普推出比預期更嚴厲的關稅政策，對日本政治經濟有多大的影響？美日貿易談判的結果是否會讓長期成長停滯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？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要先從日本戰後經濟結構的演變談起。

眾所周知地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幾乎成為廢墟，但其後由於世界迎來冷戰時期，美國為讓日本成為抵禦共產勢力的橋頭堡，因此提供經濟援助讓日本迅速復興，再加上其後韓戰、越戰相繼爆發，日本成為美國軍需生產和維修的基地，日本工商業因戰爭特需而迅速復甦。1960年代，池田勇人（Hayato Ikeda）和田中角榮（Kakuei Tanaka）相繼提出「國民所得倍增計劃」和「日本列島改造計劃」，讓日本經濟更是突飛猛進，在1968年一舉超過英、法、聯邦德國三國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被稱為日本戰後經濟奇蹟。

然而，1985年讓日幣大幅升值的「廣場協議」（Plaza Accord），成為日本經濟由盛轉衰的關鍵。當時日本政府為解救因日圓升值而受到打擊的出口產業，從1980年代後半期開始以內需為主導，採取低利率等擴大經濟景氣的政策，結果在貨幣過度擴張的情況下，大量過剩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市，造成房地產、股票價格大幅上升。1986年到1990年



間，日本景氣泡沫加速擴大，1986年日本總體經濟超越蘇聯，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超越美國，奪得世界第一的寶座。

在1985年到1989年間，日經指數（Nikkei Index）上漲三倍，本益比（P/E Ratio）達到一百倍左右。東京地價上漲2.7倍，整個日本的房地產總值是美國房地產總值的五倍，日本各項經濟指標在1989年達到空前的高峰。於是，為防止經濟過熱現象持續，日本政府接連推出限制不動產融資的措施，日本銀行也採取提高利率、收緊貸款政策，減少貨幣供給，但結果是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，土地和資產價格崩盤，銀行業出現巨額不良貸款問題，隨着信貸收緊、企業投資減少以及個人消費下滑，經濟增長當然呈現停滯狀態。

為解決經濟長期低迷不振的問題，日本一直採用增加公共投資的凱因斯理論，結果是國家收入長期少於支出，使得日本的公共債務一再增加，財政問題日益嚴重。到2024年11月底為止，日本國債、短期債券、政府借款達到1,311兆421億日圓的歷史新高，占GDP比重約為251%，這種債務占比世界最高。國際貨幣基金在2015年提出警告，日本若不採取行動節制支出，到2030年時負債將三倍於經濟規模。

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設法增加收入，如此才有付利息甚至償債的能力，否則國家會被過多的負債拖累。如累積的債務越高，日本越難大幅升息，因為利率上升表示償債成本增加，但為穩定市場情緒，又必須讓利率正常化。由於川普將大幅提升進口商品關稅，則通貨膨脹將重新上升，美國公債殖利率上揚，也拉抬日本公債殖利率走高。目前日本計畫重新設定償債成本的累計利率為2%，但如此一來單是利息在十年內就將從8.6兆日圓增加一倍到17.1兆日圓，這樣日本政府就必須在2025年發行新公債，否則無法應付國家運作的支出，但這樣債務又會不斷增加。

因此，在經濟復甦未穩、地緣政治風險高漲之際，日本如何在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尋得平衡，以及如何因應川普改變全球經貿結構的政策，與美國談出日本國民認為有利的經貿協議，進而提振日本目前低迷的經濟，就成為日本政府當前的急迫課題。

## 貳、日本的經濟困境

過去日本經濟總量曾長期穩居全球第二，但自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，日本資產流出海外與產業空洞化，使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，其後2008年金融海嘯更重創日本，使得原本長期都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資產國日本，到2010年被中國超越，退居世界第三，甚至在2023年使得日本GDP（約4.2兆美元）被德國（4.4兆美元）超越，從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退居第四。更令人感嘆的是，連美國加州的經濟規模近日也超越整個日本，這個數據反映日本國力趨於疲弱的事實，未來日本在全球舞台的存在感恐將隨之降低。

儘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（Shinzo Abe）2012年上任後，推行以「大膽的貨幣政



策」、「靈活的財政政策」和「促進投資的成長戰略」為支柱的「安倍經濟學」，試圖復甦持續低迷的日本經濟，而日本銀行也於2016年實施負利率政策，試圖透過鼓勵借貸和支出來對抗長期通貨緊縮。此舉確實提振日本企業的出口競爭力，而海外來的投資一時也有回升，使日本暫時擺脫經濟負成長。

然而，從利率依舊低迷來看可知，安倍的三支箭對通膨和經濟成長的刺激卻收效甚微，只有負債對GDP比例持續增高。安倍經濟學未能改善日本經濟的關鍵，在於第三支箭的「結構性經濟改革」沒有成效。也就是說，國家的經濟結構沒能調整成為收入大於支出，因此無法擺脫債務的危機和束縛。

其後，2011年東日本地震海嘯和福島核災更重創日本，特別是核電廠全面停工檢驗，使得日本必須進口更多火力發電用化石燃料，在日圓政策性貶值的背景下，原本長年都是貿易順差的日本，開始不斷出現貿易赤字，2014年貿易赤字約十三兆日圓。其後，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的大流行，烏克蘭危機導致能源價格飆漲，使得日本在2022年的貿易赤字更高達二十兆日圓，更加打擊日本長期疲弱不振的經濟。

日本和美國同樣是以內需為主的國家，消費約占GDP的六成，國際貿易雖然重要但進出口比重僅約15%。然而，由於少子化和高齡化的影響，無論怎麼努力，購買力很難提升，日本的內需依舊不振。因為國家收入無法增加，日本政府只好以增加消費稅，以此負擔國內龐大的財政支出。同時，安倍政府將消費稅從5%上調至10%，結果反而更加抑制國民的消費意願。內需消費持續疲軟，這是日本經濟最迫切的問題之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歷經數十年的通貨緊縮後，日本不但當前復甦的火苗相當脆弱，更可怕的是威脅日本經濟的已非通貨緊縮，反而是日本期待已久的通膨壓力，因為物價上揚會侵蝕日本經濟的復原力度。由於日本經濟持續性停滯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，使得目前日本經濟的潛在成長率僅約0.5%，只要環境稍有變動即可能陷入衰退，脆弱性遠高於其他經濟體是日本經濟的罩門。

### 參、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

如前所述，雖說目前日圓大幅貶值，使得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縮水，但日本全球排名不斷下滑，其主要原因之一是1985年廣場協議讓日圓大幅升值，引發199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機。這場泡沫經濟崩潰導致的金融危機，造成土地和資產價格崩盤，從而銀行業產生巨額不良貸款問題，隨着信貸收緊、企業投資減少以及個人消費下滑，使得日本長期通貨緊縮，經濟增長當然呈現停滯狀態。

同時，日本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，同時也開始面臨人口衰退與勞動力短缺問題，這讓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。由於社會壓力導致生育率不斷降低，2024年日本新生兒首次跌破七十萬關口（68萬6,081人），創下自1899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紀錄。緊接著，2023年



底日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重已經接近三成，2025年老年人口數甚至超過少年人口數的兩倍。老齡人口佔比的提升，對於國民個體消費結構、家庭消費結構以及公共服務消費結構等都有直接影響，作為消費主力群體的青年人口減少，導致私人消費整體下滑，人口結構嚴重失衡成為日本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。

另一方面，2024年日本死亡人口是創下歷史新高的160萬5,298人，日本人口自然減少（死亡減出生）數達到空前的91萬9,237人，這已經是日本人口連續第十八年呈現自然減少趨勢。日本人口在2009年達到1.28億的最高峰，其後由於「生不如死（出生人口少於死亡人口）」使得人口開始減少，到2025年人口已下降到1.23億，日本社會正面臨遠超預期的「人口懸崖」。

尤其甚者，人口高齡化不僅影響消費，少子化導致的人口減少，還會造成勞動力嚴重短缺。勞動力市場面臨緊張局勢，導致生產率的下降和企業競爭力的減退，從而對經濟增長造成嚴重影響。另一方面，由於日本人力成本提高，而海外新興市場需求旺盛，因此日本在1980年代就開始將工廠陸續遷移國外，導致日本產業開始出現空洞化現象，到2024年日本企業在海外生產的比例高達71.1%，可見問題的嚴重程度。

同時，日本一直以增加公共投資，來提振經濟改善通貨緊縮，由於高齡化、少子化必然導致稅收減少，使得日本政府只能一再舉債應付財政缺口，於是日本政府債務迅速增長。高額債務對經濟活動和公共投資產生限制，而追求財政紀律和削減債務負擔的政策目標，往往受到內部政治壓力的干擾，這種情況使得日本財政狀況越發嚴重。

再者，日本某些產業存在結構性問題，如過度保護農業部門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，使得日本長期以來創新力不足，缺乏新興產業的崛起，也限制日本經濟的潛力。新興經濟體崛起，使得市場規模相對縮減，同時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也逐漸減少，而國際貿易摩擦、匯率波動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等因素，進一步削弱日本經濟復甦的動力。

日本產業空洞化、經濟泡沫破裂、勞動力不足等結構性問題，使得日本經濟陷入漫長的低迷期，經濟學界甚至將日本這些經濟問題稱之為「日本病」。日本若要擺脫失落三十年的陰影，實現可持續的發展，並重拾經濟增長的動力，日本需要採取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措施，如應優化金融體系、推動人口政策改革、改善政府財政狀況、推動結構性改革和創新，積極應對國際競爭和全球經濟環境的挑戰。

## 肆、美日經貿談判

屋漏偏逢連夜雨，美國川普政府上來之後，要求日本立即改善對美貿易失衡問題。川普認為，美國可透過增加關稅改善貿易赤字，而關稅收入提高也會減少財政赤字。於是，川普基於《貿易擴展法》第232條，對所有國家徵收10%一般關稅，並針對個別國家貿易赤字額外課徵「對等關稅」。在7月9日「對等關稅暫緩期」到期後，美方將根據每





個國家貿易赤字與敏感產業課徵不同稅率。

由於目前美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約為680億美元，因此日本被列入24%「對等稅率」名單。川普對日經貿談判尤其強調汽車與農產品領域，主張對汽車及零件加徵25%。這項措施直接衝擊日本汽車、鋼鐵等關鍵產業，迫使日本政府緊急啟動談判。在美日談判中，川普明確將關稅與安全保障掛鉤，要求日本增加駐日美軍負擔份額，並強化半導體、稀土等關鍵領域的供應鏈合作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，「貿易談判必須服務於國家安全利益」，這顯示川普政府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一貫立場。

日本石破茂（Shigeru Ishiba）首相的因應策略是提出「雙贏協議」目標，主張日本可藉由共同投資造船、航空與稀土供應鏈等長期合作，逐步拉近貿易平衡，但美方認為這些措施難以短期見效，甚至聲明「對日本的貿易赤字已達無法忍受的水準」，堅持對日本最重要出口項目的汽車產品徵稅。

一旦「對等關稅暫緩期」到期，美國可能正式對日提高汽車課稅，這對依賴美國市場的日本車廠將是沉重衝擊。川普此舉可能對美日同盟帶來長遠陰影，特別是目前距離日本參議院選舉時間緊迫，石破首相當然不願在選前簽下「不對等協議」，因此雙方談判暫陷入冰封狀態。日本政界勢必得在國內經濟利益與國際政治壓力之間作出艱難取捨。

## 伍、結語

如前所述，日本經濟結構有其脆弱性，因此當川普祭出貿易關稅，會令日本經濟前景蒙上陰影。然而，日本經濟前景未必只有悲觀，因為日本的通貨緊縮局面近年開始改觀，物價上升伴隨薪資調漲，有助於提振經濟溫和復甦。雖然今年因關稅衝擊，使得經濟發展將呈現低迷，但只要全球貿易狀況沒有進一步惡化，而日本國內體制結構改革得宜，2026年起日本經濟有望溫和反彈，有機會逐步走出長期低谷。

同時，日本要走出通縮的經濟良性循環，單靠調漲薪資、恢復消費只能短期維持，後續還需日本企業持續投資、改善利潤，以及將資金投入創新型研發，這是能在未來持續保障調漲薪資的基本前提。日本企業需同時進行創新型研發投資以及廠房設備的投資，才能使日本製造業攀上全球的價值鏈，否則日本未來仍有可能再度陷入生產率／競爭力相對弱化，導致實際匯率貶值、消費及實際收入弱勢的循環。

就此而言，往後日本政府應聚焦在中美衝突、生產供應鏈動盪、能源依賴等經濟安全的核心議題，思考如何讓製造業回國、提高本土能源自給率，同時還有強化與美國、韓國、台灣及部分東南亞盟國的供應鏈協作。目前國際環境瞬息萬變，日本須在刺激經濟與財政紀律之間尋求平衡，今後日本應著力於提高最低薪資、強化人才培育與相關投資以及提升產業數位能力等。日本經濟能否重拾成長動能，後續將考驗這個亞洲經濟巨人的智慧，全球都將關注這場經濟戰未來的發展。◆